

第一章 緒論

歷經北伐與中原大戰後，中國表面上儼然已形成一個統一局面，此時日本恐怕中國統一在即，從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，逐步加速其侵華速度。但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政府，盱衡國內外情勢，認為此時中國國力不僅無法應付與日本的作戰，還須防患共黨勢力的日益擴大。故一方面持續進行剿共以安內的政策，另一方面則拖延與日本直接交鋒的時機，好爭取建設時間與國際援助。¹除了日本與中共的威脅外，中央面對地方實力派林立，也須應付他們藉抗日反蔣為號召的挑戰。中央認知自己當時對這些地方勢力尚無立即降服的能力，所以只要這些地方實力派願意在表面上投誠中央，中央也選擇盡量與之合作，²並透過鼓吹安內攘外政策，期望他們協助中央對付日本與共黨，可見地方實力派在戰前的態度與角色是影響政局發展的一個關鍵，本論文擬以閻錫山為個案，討論地方實力派對戰前政局的影響及其與中央的關係。

閻錫山歷經民國 19 年的中原大戰後，與蔣的關係跌蕩到谷底，最初蔣一時無法容納閻，力逼出洋，³可是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卻打亂中國的政局發展。在日本侵略與寧、粵分裂的雙重壓力下，蔣為尋求國內團結，回應合作呼聲，只好允許閻重返山西，進而接掌山西政權。故閻這樣的政治命運轉折，無異象徵

¹ 周美華，《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》（臺北：國史館，2000年）。該書對國民政府從對日不抵抗政策到全面抗戰的過程有詳細解說。

² 蔣中正在幾次地方實力派反蔣事件中，皆強調政治解決優先軍事解決，例如兩廣事變（詳見第三章第三節）。

³ 〈蔣中正電張學良以劉春榮被殺為例希張勸閻馮離晉出國以維和平〉，民國19年10月26日，國史館藏：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（簡稱《蔣檔》），〈籌筆〉，統一時期，53冊35號。

國民政府在日本侵略的衝擊下，如何遷就時勢以接納原本水火不容的地方實力派，營造國內團結景象，所以本論文以閻錫山為研究對象，是了解中央對地方實力派關係的一個很好例子。閻自民國初年起就開始統治山西，力行保境安民政策，對山西的影響力相當深遠，自立為王色彩尤為鮮明，這種扎根地方型的地方實力派，歷經民國以來詭譎多變的政局情勢，政治經驗豐富，我們可從其應變方式與政治手腕的運用，更加認識戰前政局的複雜面貌。

另外，如就戰前時局來看，中國在東三省、熱河相繼陷日後，山西、察哈爾和綏遠頓時成為保護平、津的重要抗日前線，閻及其遍佈察、綏等地的舊屬勢必對華北、西北軍事造成一定影響力，閻的舉措是日本、南京中央與中共三方面勢力的注意焦點之一，顯現閻在戰前確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。⁴

本論文的章節安排除緒論與結論外，主要章節如下：

第二章「中原大戰後與中央關係的轉變」，旨在說明戰後閻如何從政治生涯谷底重回山西掌權的過程。可觀察政局演變促使閻、蔣關係再次變化，藉以認識閻的應變能力與蔣的考量。並且透過山西軍權的爭奪，了解閻如何重新穩固山西領導權。

第三章「抗日事件中的態度」，是從戰前國內三次非閻主事或發起的反日事件為切入點，側面了解閻的立場與態度對事件或政局造成的影響。這三次事件中，察省與兩廣皆是地方藉抗日以反蔣的事變，閻也是一位地方實力派者，介於其他地方實力派與中央之間，從其立場反映閻對時局的認識。華北事件雖由日本發動，但閻的立場、態度也可幫助我們認清閻與日本、其他地方將領、中央間的多角關係。

第四章「等距方針的調整」，說明因為山西受到日本、共軍的直接威脅，無法再沿用其舊有的「等距方針」政策，所以在共軍入晉、綏遠戰役及西安事變中，與中央、中共的關係時有調整與變化。認識閻的變化，可幫助統合分析閻的政治性格，並了解中國內部聯共反日的風氣已然形成。

針對民國時期的地方實力派角色，其實臺灣學界已有不少專門論文討論，

⁴ 閻錫山曾自云：「曾有六次努力，於中斡旋壓制，不使國家分裂。」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，《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：長編初稿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年），頁2171。

例如：彭宗誠〈劉湘及其與國民政府之關係〉，⁵透過研究劉湘，探討民初時期四川的軍政狀況及其與中央的關係發展；林明忠〈北洋時期奉系軍隊之研究(1916-1928)〉，⁶研究奉系的發展過程，藉以顯示民國初年軍閥政治的多樣性與複雜性；徐敏蕙〈盧永祥研究〉，⁷討論盧永祥在直皖相爭過程扮演的角色；林貞惠，〈馮玉祥與北伐前後的中國政局(十三年—十七年)〉⁸，說明馮玉祥在北伐時期的軍事活動，檢討其對民國統一的影響與得失。⁹並且也有對閻錫山的專門研究論文，包括有曾華璧《民初時期的閻錫山：民國元年至十六年》，¹⁰討論北伐之前閻的政治生涯，對了解閻的政治性格有很大助益；陳曉慧〈閻錫山與抗戰〉，¹¹討論閻在抗戰時期與中央、日本、中共的交往情形，明白閻在抗戰時期發揮的作用；陳美惠〈閻錫山與山西村政(1917—1937)〉，¹²則是從地方建設的角度，研究閻在山西的村政建設，讓我們具體清楚的認識閻如何落實在山西的建設，以致對山西能發揮影響力。近幾年還有陳進金的《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》，¹³詳細描述各個地方實力派在中原大戰中扮演的角色，其中包括閻在大戰中的作為、影響力及其政治命運的轉變，並幫助我們掌握中原大戰前後的中國政治局勢發展。

至於中國大陸學者對閻錫山的研究情形，如就書籍數量看來，確是比臺灣

⁵ 彭宗誠，〈劉湘及其與國民政府的關係〉(臺北：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9年)。

⁶ 林明忠，〈北洋時期奉系軍隊之研究(1916-1928)〉(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8年)。

⁷ 徐敏蕙，〈盧永祥研究〉(臺北：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7年)。

⁸ 林貞惠，〈馮玉祥與北伐前後的中國政局(十三年—十七年)〉(臺北：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0年)。

⁹ 還有許多相關性論文，例如：遲振漢，〈近代中國中央地方關係之研究〉(臺北：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0年)；金鴻文，〈張作霖生平之研究〉(臺北：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6年)；毛金陵，〈北洋直系軍隊之研究(民國六年至十六年)〉(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6年)；黃益謙，〈陸榮廷與廣西〉(臺北：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5年)；楊同慧，〈孫傳芳與五省聯防〉(臺北：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4年)；楊維真，《從合作到決裂—論龍雲與中央的關係(1927-1949)》(臺北：國史館，2000年)。

¹⁰ 曾華璧，《民初時期的閻錫山：民國元年至十六年》(臺北：臺大出版委員，1981年)。

¹¹ 陳曉慧，〈閻錫山與抗戰〉(臺北：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8年)。

¹² 陳美惠，〈閻錫山與山西村政(1917—1937)〉(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1年)。

¹³ 陳進金，《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》(臺北：國史館，2002年)。

多，這跟閻的反共立場有關。這些著作想透過軍閥惡鬥、人民痛苦的角度來描述閻在山西的作為，藉以批判其意識型態，不免有失歷史研究的客觀性。¹⁴以《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》¹⁵一書為例，撰寫過程歷經二十二年（1959—1981年），召集了前山西黨、政、軍人士約三十多人，分軍事、政經、黨團及對外關係四組來編寫，從其對資料來源至編寫方法的強調情形看來，中共確實是想努力證實這些史料可靠性與方法有效性，但如果我們從描述方式與結論來分析此書，仍不脫唯物史觀、階級鬥爭的觀念，致使該書脫離不了為政治服務的色彩。該書的資料來源多以有關人士的日記、筆述、口述或有關文獻及報刊記載為主，雖然一手資料豐富，但考慮紀錄者的記憶力或受環境因素的影響，使我們對此書內容抱存疑態度，學者閻沁恆就曾評論：「中共撰寫此書的目的只是想藉著對閻錫山的敘述和評論，以清算閻錫山，並連帶否認許多的中華民國史實。」

¹⁶

另外，早期國外也有一位學者 Donald G. Gillin 研究過閻錫山，詳述山西在閻統治下的政治、經濟情形，除了評論閻在政治上是一位「偽善的機會主義者」外，主要還從區域研究的角度切入，特別專注探討閻對山西的經濟、實業建設，肯定其對山西建設的貢獻。¹⁷

至於閻在戰前政局的角色，除了《閻錫山與抗戰》中略有提及外，目前還未見正式學術論文討論，所以本論文的撰寫，將對閻在戰前六、七年間的政治角色做較完整的論述。研究資料則以國史館現藏有完整的《閻錫山檔案》為基礎，¹⁸輔以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、《徐永昌日記》、《馮玉祥日記》及其他相關人

¹⁴ 例如：李茂盛，《閻錫山晚年》（合肥：安徽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）；喬希章，《閻錫山》（北京：華藝出版社，1992年）等。

¹⁵ 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，《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》（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）。

¹⁶ 閻沁恆，〈評中共編《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》〉，《山西文獻》，44卷（臺北，1994年7月），頁2-11。

¹⁷ Donald G. Gillin, *Warlord: Yen His-shan in Shansi Province, 1911-1949*, Princeton: N. J.,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67. p. 24.

¹⁸ 此份檔案已提供《民初時期的閻錫山：民國元年至十六年》、〈閻錫山與抗戰〉、《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》三篇論文很大部分資料，隨著近幾年來的完全開放，及陸續整編成冊出書，是往後研究民國史的重要參考史料。至於本文選用的檔案資料，請參閱「徵引書目」。

物的回憶錄與日記為一手資料，並參考與閻相關的年譜與書籍等，試圖釐清、明白閻在戰前的經歷與作為。

閻錫山，字伯川，光緒九年（西元 1883 年）生於山西省五台縣河邊村。出生農商家庭，但因值國家危亡，有感政治腐敗、軍事失利、外交無能，遂放棄「畢生志慮」的農商，¹⁹投筆從戎。留學日本期間，吸收日本「軍國主義」成功的經驗，回國後，開始利用擔任山西陸軍學校教官的機會，組織軍隊的支持力量，收納孫楚、趙承綬、王靖國、李生達、傅作義等學生，這些人成為他往後重要的軍事將領。²⁰

宣統三年山西響應武昌起義，閻運作受推舉為山西都督。²¹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，雖仍任命閻為都督，但不信任閻，安插浙江人金永監督，作風強悍，閻自知尚無實力與袁抗衡，加上當時晉省財政窘困，²²外並有蒙人內犯危機，所以閻依賴袁甚深。²³閻此時已開始懂得在情勢中迂迴妥協，用現實利益來決定政治立場。²⁴

至袁去世，閻繼續受北洋政府任命為山西督軍，閻遂開始進行總攬大權計畫，利用黎段相爭、張勳復辟期間，閻先是令喬震開兵一部赴北京協助段祺瑞，表示對段支持，然後又宣佈山西獨立，藉以迫使山西省長孫發緒辭職。在段的支持下，閻兼任山西省長，成功掌控軍政大權。²⁵隨後閻並將兵力擴充為四個混成旅、三個騎兵團及工兵、機關槍、衛生、憲兵、警衛各一營，新購山砲十二門、三八式步槍三千枝，加強各部隊裝備，使晉軍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新力

¹⁹ 閻錫山，《閻錫山早年回憶錄》（臺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1968年），頁67。

²⁰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，《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：長編初稿》，頁27。

²¹ 原本推協統姚鴻發為都督，但因其父為清廷陸軍部侍郎，故辭不就，後有意推諮議局局長擔任，但因張樹幟持槍號召下，改推閻為山西都督。陳美惠，〈閻錫山與山西村政（1917—1937）〉，頁6。

²² 山西地貧民瘠，全省收入除錢糧外，以河東鹽款為主，但鹽款由北京控制。郭榮生編，《閻錫山先生年譜》（臺北：作者自印，1984年），頁19。

²³ 二次革命時，閻依附袁世凱，使北方無法配合南方反袁，間接造成二次革命失敗，民國二年閻更宣布脫離國民黨，向袁表示自己立場，並藉機解散國民黨在山西的各級黨部，排除國民黨在山西的發展。閻並傾力支持袁登基為帝。劉象山，〈閻錫山傳〉，《國史館館刊》，14卷（臺北，1993年6月），頁251。

²⁴ 吳振漢，《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9。

²⁵ 陳美惠，〈閻錫山與山西村政（1917—1937）〉，頁8。

量。²⁶

雖然閻利用北洋政府的支持得以穩固在山西的統治權，但在軍閥混戰期間，閻卻始終不願表示對那個軍系表示特別支持，²⁷如果受其他軍閥威脅，閻就以「保境安民，惟力是視」回應，標榜「三不要二要主義」（即不入黨、不問外事、不為個人權力用兵，要服從中央、要保衛地方治安），²⁸為閻及山西爭取擴軍與建設時間，其所作就如同其所言，「向抱門羅主義」。²⁹

但至民國 14 年，因馮玉祥的國民軍被吳奉直魯聯軍攻敗，閻有部屬趁機攻入歸綏，馮為報復，有意進擊山西，閻自知難再採閉關主義，遂改與直、奉合作，夾擊國民軍，並收編原屬馮玉祥的徐永昌、韓復榘、石友三等軍隊，閻的兵力擴增迅速。³⁰為免馮玉祥的下一波聯合「國民革命軍」北上舉動，民國 15 年 12 月閻遣人謁蔣，謂自願加入國民革命軍。³¹閻參加北伐，既是時勢所迫，也是想利用參加革命陣營，保全其在山西既有的勢力、地盤與名位的一種投機心態。³²

蔣泛論局勢，若馮玉祥部掃清陝南，聯絡鄂北之國民革命軍，再率部入豫，獲取山西響應將對北伐十分重要，雖然可能形成「晉系」，³³但為大局著想，仍樂於接受閻的效命。從民國 16 年起，閻與山西正式加入國民革命軍，受任為國民革命軍北路總司令。³⁴民國 17 年 1 月蔣復職繼續北伐，重整北伐軍為四個集團軍，閻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，作戰京漢線；6 月收復北京、天津，任閻為

²⁶ 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，《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》，頁96-97。

²⁷ 民國9、10年的直皖、直奉戰爭中，閻保持中立態度。曾華璧，《民初時期的閻錫山：民國元年至十六年》，頁61。

²⁸ 陳美惠，〈閻錫山與山西村政（1917—1937）〉，頁18-19。

²⁹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，《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：長編初稿》，頁639。「門羅主義」是指1823年美國為抵制歐洲插手拉丁美洲事務，總統門羅在致國會諮文中宣稱：美國不干涉歐洲事務和任何歐洲國家在美洲的殖民地，但任何歐洲國家也不能干涉美洲事務和在美洲進行新殖民主義擴張。閻錫山引用「門羅主義」表達其保境安民的政策方向。

³⁰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，《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：長編初稿》，頁693-695。

³¹ 曾華璧，《民初時期的閻錫山：民國元年至十六年》，頁135。

³² 陳曉慧，〈閻錫山與抗戰〉，頁21。

³³ 簡筌簧，〈晉綏軍與國民革命軍北伐〉，《中華軍史學會會刊》，2卷（臺北，1997年5月），頁243。

³⁴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，《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：長編初稿》，頁741。

平津衛戍總司令；8月兼任太原政治分會主席；9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；10月任內政部長；12月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。閻自此已是官銜稠疊，在政治上具舉足輕重影響力之要人。³⁵

北伐後的中國軍權林立，可分成六大軍權中心：南京—蔣中正、廣州—李濟琛、武漢—李宗仁、開封—馮玉祥、太原—閻錫山、瀋陽—張學良。閻的勢力範圍擴展極大，包括冀、察、綏、晉、平、津。中央無法任憑軍權分散，於是民國18年1月實施國軍編遣會議，閻表面上贊成，謂「裁軍就積極方面來說，可騰出財政用於各種建設；就消極方面來說，可使人民安居樂業，發展工商業。」³⁶以保持與南京中央的良好關係，但事實上閻卻與中央漸生歧異，³⁷所以民國18年3月閻多次與馮磋商反蔣順序，³⁸只是因為閻容易疑心，又缺乏反蔣決心，遲至民國19年2月才確定電蔣，勸其「禮讓為國」，共同下野。³⁹終於掀起與蔣的對立局面，引爆中原大戰。

觀察閻的統治類型，其實可代表民國「省區軍閥」的標準典型，控制一省，並執著掌握省的軍政大權，雖堅持個人統治，但亦隨時代潮流而調整應付策略，在袁世凱時期倡導軍國主義；軍閥混戰時，標榜保境安民；北伐以後，又對所謂的「統一」有所反抗；自民國20年起，再次利用局勢的變動，追求集山西的黨政軍領導權於一身，評論閻的政治手段與性格，閻可稱的上是一位「善於運用環境」的政治人物。⁴⁰

³⁵ 劉象山，〈閻錫山傳〉，《國史館館刊》，14卷，頁253。

³⁶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，《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：長編初稿》，頁1024。

³⁷ 閻原本希望中央和平處理西北軍問題，但中央要閻武力討伐，閻無意與西北軍決裂。而且中央答應給晉綏軍的給養經費常常未達標準。因此閻與中央有歧見。劉維開，《編遣會議的實施與影響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9年）。頁160-168。

³⁸ 決定先由西北將領來電，指責現在政治不良。閻以安心編遣，以達救國初衷。西北將領再通電，述蔣包辦三中全會及中東路與濟案失敗等罪狀，由西北將領擁閻馮為國民軍總、副司令，閻一面辭，一面電蔣請其下野，將國軍交國人。馮玉祥，《馮玉祥日記》第三冊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58。

³⁹ 〈閻錫山致蔣中正蒸電〉，民國19年2月10日，國史館藏：《蔣檔》，〈革命文獻〉，統一時期，第7冊，頁29。

⁴⁰ 陳美惠，〈閻錫山與山西村政（1917—1937）〉，頁10。